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孙景尧 著

沟通之道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复旦大学出版社

孙景尧 著

沟通之道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沟通之道/孙景尧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07737-7

I. 沟… II. 孙… III. 比较文学-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5335 号

沟通之道

孙景尧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赖英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5 字数 294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37-7/I·579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工作,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丛书”,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序：致读者——我与比较文学

无论我在复旦大学当学生，还是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我都没有像如今大学生或研究生那样的机会——有专门时间并有专门教师给我系统讲授比较文学课。但我倒有另一份“福气”，引我走上了比较文学的专业之路，这就是比较文学本身的学术魅力和前辈专家学者不时的教诲与提携。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比较文学”这个词，那还是 30 多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当时，比较文学是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伪科学”而被打入“冷宫”的。一位年长的“右派”朋友，向我偷偷地推荐了傅东华译的洛里哀写的《比较文学史》和侍桁译的勃兰兑斯写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书；我也只是悄悄地读了这些书，囫圇吞枣、一知半解，留下了一个模糊却很有劲的想法：既然他们能将本国文学同外国文学作比较研究，那么中国文学同外国文学不是也能这么研究吗？当然，在那个十年浩劫的非常时期，我的这个想法，始终没有付诸实现，但它却隐隐地影响了我的读书和思考，也使自己有意和无意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卡片和资料。

我真正学习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并斗胆走上讲台开课，那还是靠了贾植芳老师的具体指导和钱锺书先生的热情支持。“文革”刚结束不久，我在贾植芳老师临时居住的复旦体育场看台下的房间里，连着几次听他讲解和介绍比较文学的主要参考书和代表性论文，他如数家珍又评述精当，使我一下子随他从二三十年代走到了现在，也明白了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衰起落。那时候读书也特别有劲，照着贾先生开列的书目，去借、去读甚至去抄，居然在大热天还一字一句抄下了全本《比较文学论》，实在是得益匪浅。用我一位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好友的话来说：“你弄清的家当，至少比一般去读书和找资料要节省 5 年时间。”他说得极是，没有贾先生的热诚指导，我是不可能健康地走上比较文学之路的。次年暑假，我将自己准备了近两年的“比较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寄给了钱锺书先生审阅。钱先生很快回信，奖掖之

意,溢于言词,说:“就目前国内已有的资料而言,是不能再完备了。”后来,我又带了比较文学概论的讲稿,到上海请贾先生具体指导。此时贾先生已被落实政策,并重登学坛了,住所也换到了他“出事”前住的原屋,而且约稿频繁,还要成天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但他却放下手头工作,对我的讲稿从头至尾认真审阅和细致指正,其间还不断鼓励我多讲授两遍,边讲边改边完善,争取公开出版,并说:“我来写序,向大家推荐。”这就是后来我敢在广西大学开讲比较文学导论课,以及同卢康华教授合著《比较文学导论》一书及其“序”的由来。如今,贾先生已经仙逝,而我也早已过了知命之年,每次拜访贾老,他那甘于寂寞、甘于淡泊的做人治学风范、他那热忱待人和提携后学的不倦精神,依然还令我景仰不已。

杨周翰先生,是我1983年在天津比较文学讨论会上认识的。学术界都传说,杨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人也严厉严肃,好像大家既尊崇他又有些“害怕”他。因此,杨先生要我去他房间“聊聊”,我是抱着学生应考的惶恐心情去见他的。然而,他同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紧张:“我在欧洲开会时,雷马克、韦斯坦因教授都向我打听你,我还以为你是我们西南联大前后的人呢,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听说你是复旦毕业的,你认识董亚芬先生吗?”我说她是我的英文老师,杨先生笑笑说:“那我们也算有些‘渊源’了。”接着他就给我介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情况,并问我对学生开课的内容与体会。过后,我曾问过董老师,她告诉我杨先生是复旦英文系的兼职教授,曾指导过她,因此,我对杨先生始终是执弟子礼,他也始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1985年,他将吉列斯匹教授的论文《比较研究的新趋势》交我翻译,我翻译一部分就请他校译一部分,前后4个月,他都字字句句地予以校正,并传授了许多翻译的技巧和手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翻译的体会:“要母语好,还要吃透了原文再译。翻译是种‘匠活’,师傅带徒弟也许是个好办法。”《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这本被乐黛云教授肯定的译著,就是杨先生口传身教我学翻译的结晶。在我同杨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他也都是时时在“带”我。在巴黎,有两个整天他带我参观卢浮宫,给我现场讲解艺术史;在美国,他带我逛书店,为买到《模仿》、《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等书而高兴;平时我去信请教学问,他也详详细细给以答复,那言简意赅的文言行文,使我深深佩服这位英文教授所具的扎实古文功底。杨先生去世前给我的那封信,嘱咐我“密切关注国际学坛之动向,勿轻信,宜多思。”“多思”至今仍是我

和我的学生读书学习的座右铭。

我同雷马克和韦斯坦因两位教授的相交,既属偶然,又属“媒介学”的成果。1983年,我收到雷马克的第一封来信,那是我的一位朋友同他通信作“媒介”的结果。我应约,给他寄去了我的论文。雷马克“非常赞赏”我论文的观点,并随即寄来了一大批资料和专著。同时,他又把我“媒介”给了韦斯坦因教授和韦勒克教授。韦勒克也跟着给我寄来他的著作,而韦斯坦因则干脆直接前来我工作的大学访问与讲学。从此,我们就书信往来、著作互赠、探讨学术还展开争论。韦斯坦因教授不愧是国际比较文学大师,求真求实,对人对己都一视同仁。一方面对我批评他在著作中流露出的“欧洲中心”观点,他不久就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发表的论文《我们何来,是什么,去何方》中,作了公开反思:“这种观点长期一直在比较文学界流行,而我本人在我的书里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回想起来颇为后悔。”另一方面,他作为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主编,向我约稿,发表时竟将我的《比较研究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对应物》一文,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四分之一,毫不客气。我对照原稿,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论文是发表给学术界同行看的,不必重复学界已知道的东西,而是应当清晰到位地论述自己新提出、新发现或新解释的问题。在与他的交往中,他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1988年他邀请我去印第安纳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的事。我一到他负责的比较文学系后,他不仅将自己的办公室供我使用,而且还将他终身积累的资料全部展示给我。他在交给我资料柜的钥匙时说:“你可以随心查阅或复印,比较文学是开放的,我的全部资料也是对你开放的。”我至今都无法算出,这使我在追踪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能省去多少寻找资料的时间?我至今也无法全弄明白,一个国际比较文学名家,为什么会对异国学者如此袒露胸怀倾其所有?我想,这大概就是比较文学家的开放精神罢!1993年,当我结束了在斯坦福的博士后研究,再次走进印第安纳大学校园时,韦斯坦因已离校去欧洲定居了。没人知道他的近况,但他走之前在原比较文学系系主任B·米契尔教授葬礼上的讲话,却依然被人记着:“米契尔的去世,我的退休离去,标志着一代比较文学的结束……”

在给过我学识、教益和帮助的前辈专家学者名单上,还可开列许许多多,仅本文所提到的已退休或作古的先生中,仍然必须添上的还有:法国的艾琼伯教授,那是在家中热情接待我,并坦率陈述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看法的

“欧洲汉学第一人”，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他对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倾心与热望，固然令我肃然起敬，但又何尝不是激励我努力奋进的动力。而取了中文姓名的美国人李达三教授，是邀请我去香港中大作比较文学研究和不断惠赠参考书的热心人，他对国内比较文学发展的关心与投入、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界弊病的担忧与无奈，既让我感动，又使我“勿轻信、宜多思”，不敢人云亦云。现已退休的乐黛云、廖鸿钧、卢康华、刘以焕、刘献彪、陈惇、应锦襄等教授，也无不以各种方式给过我启发和教益，而且至今都还是我笔谈学术人生的良师益友，在治学路上我时时都能感到知己好友的浓浓情谊和阵阵温馨。

在将我引上比较文学专业之路的众多提到和未提到的前辈先生中，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益友，有的是忘年之交，有的是异国知己，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仙逝他去，然而他们对比较文学的贡献，给我的种种教益，是不该忘记，也不能和不会忘记的。我总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前不如前辈，后不及后学”的比较文学“中介者”，但我愿意将我所知前辈的治学风范，告诉我年轻却又无缘结识他们的莘莘学子；我还非常愿意借此短文，向我的各位老师深表敬意与谢意！尽管这是远远不够也远远不足的……

（本文初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的
“我与比较文学”栏目，原名为“我的比较文学老师”。）

目 录

序:致读者——我与比较文学	1
---------------	---

闻 道 章

对比较文学始于 19 世纪的质疑	2
20 世纪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三次论争	8
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 ——兼谈“反民族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	22
“进一步、退两步”还是再反思、再认知 ——从美国对比较文学独立学科性质的一种新说谈起	33
“垂死”之由“新生”之路 ——评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	44
巴斯奈特同谁“较劲”,又同什么“较劲”? ——评《21 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的欧洲中心观	53
为“中国学派”一辩	58

论 道 章

试论可比性	68
跨文化影响研究的“有效化”	90
原动力的流向与结果之一	100

论伊安的口语文学表演实质和柏拉图的误断	
——对柏拉图《伊安篇》的反思与认知	110
中美“说书”的比较研究	121
留得真爱在人间	
——从中欧文学经典中的自然灾害作品谈起	131
真赝同“时好”	
——首部中国文学史辨	144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	159

探 道 章

“格义”与“况义”	168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学比较成分探	185
中西文化早期交往的复合媒介者：“扶南”的媒介特点与作用探	
——兼论基督教文化最早入华的上限问题	200
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	212
试谈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	
——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太子和太后教名碑谈起	224
借传统之形与传统之力弘传“福音”之路	
——论贵州安龙教区布依族村寨传统对联中的天主教因素及其启示	246
贵州安龙现存天主教遗物考释	263
附录：书序选	272

闻道章

- 对比较文学始于19世纪的质疑
- 20世纪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三次论争
- 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
- “进一步、退两步”还是再反思、再认知
- “垂死”之由“新生”之路
- 巴斯奈特同谁“较劲”，又同什么“较劲”？
- 为“中国学派”一辩

对比较文学始于 19 世纪的质疑

一、疑 惑

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比较文学的萌芽,即它开始出现的时间都定在 19 世纪;而且又都认为,它是在对欧洲基督教文化体系内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关系,并主要限于它们彼此影响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得以产生与形成的。

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 V. Tieghen)在他 30 年代所著并长期以来被视作权威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过,比较文学的“最初论文”,是产生在“19 世纪”,他颇为可怜地描述当时情形说:“在 19 世纪初年,德国有许多文学史家稍稍让了一点地位给真正的比较文学。”^①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虽然比较文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的成长与发展,更是扩大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课题,并愈来愈受到广大学者关注和采纳;然而,遗憾的是,在谈到比较文学的萌芽时,却依然囿于半个世纪前的这一传统结论。

就是在美国霍曼教授(C. Hugh Holman)编著并于 1980 年出版的《文学手册》中,在“比较文学”这一条目的解释里,当说到萌芽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在 19 世纪,同比较宗教研究一道,欧洲的学者们也开始去发展不同国家和语言的文学间的比较研究之各种理论和方法。”^②并且还具体地提到其最早的一批欧洲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像维尔曼(Villemain)、昂拜尔(Ampere)等人。熟悉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人都清楚,这批学者都是在 19 世纪以他们对欧洲各国文学进行影响研究而闻名于世的。

这一传统说法,甚至也影响到今天正在兴起的年轻的中国比较文学界。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22 页。

② C. H. Holman,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1980, p. 94.

事实上,众多的各国学者的这一传统认识,即便不是错误的,也至少是不全面的。

二、回 顾

早在欧洲人进行“古典学问的再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有人开始了从东方古代文明里汲取营养的尝试。此后,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和“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的形成”^①,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东西方向间的文学交流也渐渐增多起来。进入18世纪,这种译介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著作的努力,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中国趣味热”^②。

1718年,法国人雷纳多(A. E. Renaldot)翻译了《第九世纪伊斯兰教二游历家印度中国见闻录》一书,如果这还不算真正的文学著作的话,那么1731年到1734年,法国耶稣士会出版的,并收有中国寓言和小说在内的《中华帝国全志》,则有相当多的部分已足可列入文学的范围了。过一年,法国的杜赫德(J.-B. DuHalde)出版了收有中国明代白话小说《今古奇观》在内的《中国通志》^③。1734年,巴黎《水星杂志》刊登了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杂剧》的几段译文^④;而到了1741年,英国的哈切特(William Harteheht)则出版了他的译著《中国孤儿》(*The Chinese Orphan*),这要算是欧洲翻译介绍中国戏剧的最早的完整译本之一^⑤。不久,就在1755年,巴黎上演了第一个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⑥;略为晚些时候,伦敦也上演了这一同名剧的英译本^⑦。

这一热潮,一直到1762年英国的汤姆斯·帕西的《中国诗文杂著》的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9页。

② “中国趣味”(Chinoiserie)出自〔英〕多布森的《肯辛顿故宫》、《牛津世界名著丛书》,1926年,第209—213页。

③ 杜赫德:《有益而有趣的信札》(*Letter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第3卷),1735年,第339—378页。

④ 同上书。

⑤ 见《岭南学报》1929年第1期,第116—118页。Thomas Pere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 1762。

⑥ 伦敦《每月评论》第13卷,第495—505页。转引自:《“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⑦ 谋飞(Arthur Murphy):《中国孤儿》(*The Chinese Orphan*)。他的文艺活动,包括该剧的演出,可见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第1卷,第356—357页。

版为止,从未停息^①。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洲的古典戏剧的最早一批对比研究的论文,在18世纪的德国、法国和英国先后问世了。

对近代文化思想影响极大的伏尔泰,就曾在如今收在《伏尔泰全集》第5卷的一篇文章中,拿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同欧洲同类戏剧作了有趣的对比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学同欧洲各国文学一样,虽然因气候、政治和宗教的不同而存有差异,但总是有许多“合理近情”的原则,也总还有美好的“理性主义”。他在对比时指出,《赵氏孤儿》就故事来说,非常离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清楚;若与同一时期的法国等欧洲戏剧相比,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当然,由于伏尔泰对古典主义的推崇,使他对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及西班牙戏剧都持否定之说。伏尔泰囿于他的这一观点,使他在进行上述对比的同时,得出了中国戏剧的技巧比欧洲的古典主义悲剧要显得粗糙和幼稚的“幼稚”之见:“我们只能把‘赵氏孤儿’比作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只有海峡那边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人才能欣赏。”甚至还武断地说中国的剧作家“没有一点好的审美趣味,丝毫不懂得规则”,中国的戏剧只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

与伏尔泰差不多时期,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赫尔德(Richard Hurd)却于1751年发表了与伏尔泰观点相反但方法类似的《论诗的模仿》一文。应该说,这是近代欧洲用比较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评论最系统、最详尽的一篇比较研究论文。赫尔德将《赵氏孤儿》同古希腊悲剧对比,他指出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厄勒克特拉》(*Electra*)同《赵氏孤儿》在情节、主题、复仇动机、诗句、结构与布局的相似之外,还进一步分析与探求其原因,他采用了实际上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发展而来的“诗的模仿说”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同古希腊作家一样,他们都是自然的学生。他总结说:“这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跟我们隔得很远。由于各种条件的关系,也由于他们人民的自尊心理和自足习惯,它跟别的国家没有什么来往。因此,他们的戏剧写作的观念不可能是从外面假借过来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地方,他们又是依靠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因此,如果他们的戏剧跟我们的戏剧还有互

① Thomas Parcy,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 1762.

相一致之处,那就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事实,说明了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可以产生写作方法的相似。”^①

应当承认,他在比较研究这两个不同语言的国家的文学中,对其相似的原则的探讨,已经排除了“假借”的影响关系,而是提出了“自尊心理和自足习惯”,“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等心理学、民俗学与美学等的认识。这表明,论文的本身就已具有平行研究的特点了。

在18世纪的欧洲,除了上述两人外,伏尔泰的朋友阿尔央斯侯爵(Marquis d'Argens),也曾专门作过与伏尔泰观点一致、方法一样的中欧戏剧比较研究的评论,然而歌德“老人”在1827年1月31日同爱克曼的谈话,则是早于影响研究的一篇中外文艺对比研究的短论。歌德在拿中国传奇与小说同法国诗人贝朗瑞、英国小说家理查生和他自己的作品作对比分析时,他指出中国文学“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而且三次提醒爱克曼“注意”“中国诗人那样彻底地遵守道德”这一特点。他还预言这一中国文学的长处“还会长存下去”、“是人类共同财产”,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口号并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②。

可见,以伏尔泰、赫尔德与歌德为代表的18世纪与19世纪初的欧洲的一批学者,在他们对中欧文学所进行的分析评论与研究中,已经使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他们以各自的文艺理论为标准,并从两种文学间毫无直接影响关系的角度着手,对二者的相似与相异努力从美学、心理学、哲学、民俗学等方面去探求其一般规律,还明确地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目的与口号。应该说,作为今天平行研究的一些主要方法、对象、目的与手段,在他们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论著中都已具备雏形。所以,今天作为既包括影响研究又包括平行研究在内的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萌芽,是应当把它们列入,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三、检 讨

事物的发展常常不是直线推进的,“比较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众

① 引文出自赫尔德《论诗的模仿》一文,该文最早出版于1751年。

②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所周知,当欧洲学术界进入被称为“历史的世纪”的1800年以后,上述的早期平行研究的比较文学论著,不仅未能被发展与上升为平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相反还一度被影响研究所取代与淹没,直到20世纪中期才又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在英伦三岛,无论是英国最早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还是今天被称作“英国真正的比较文学史研究的先行者”的哈仑(Henry Hallam)^①,或是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论著的波斯奈特(H. M. Posnett),德意志的施莱格尔兄弟(Schlegel)、艾希霍恩(Eichhorn)、鲍特维克(Bouterwek)^②和温特尼兹(M. Winternitz),法兰西的史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维尔曼(Villermain)、夏斯勒(Philarete Chasles)、昂拜尔(J. J. Ampere)、季奈(Edgar Quinet)等教授,或是后来奠定与发展了这一学科的著名比较文学家布吕纳介(F. Brunetiere)、戴克斯特(J. Tact)、贝茨(L. poul Betz)、巴登斯贝格(Baldensperger)、阿沙尔(P. Hazard)、梵·第根(P. Van Tieghen),等等,他们全都是致力于对各国文学间的渊源、流传、媒介、文类等影响关系的考证与研究,并随之使比较文学成熟与理论化起来。可是他们的理论与认识也还是被囿于影响研究的浪潮之中,像著名的德国学者温特尼兹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就曾说过:“比较研究各族文学,追溯它们的相互关系、影响,也叫世界文学。”^③而法国的比较文学史家洛里哀(Lolier)也说过,比较文学史的“职务,是在寻溯种种知识运动的潮流,说明种种潮流的影响,并译述种种努力的形势,备作彼此比较的单位或资料而已”^④。梵·第根,这位在国际上很有权威的比较文学大师一度也曾强调:“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乃是“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学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和寻找这种影响流传关系的“起点”和“终点。”^⑤

① 夏佛尔(E. S. Shaffer), Editor's not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Brita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伦敦, 1979年。

②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23页。

③ 转引自〔德〕温德尼兹:《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金克木译,见《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

④ 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34页。

⑤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第17、49、63、202页。